

JINAN SHIXUE CONGSHU

暨南史学叢書

张其凡

历史文献学论集

主编 张其凡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暨南史学丛书

历史文献学论集

主编 张其凡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文献学论集/张其凡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2.12

(暨南史学丛书)

ISBN 7-81079-203-2

I. 历… II. 张… III. ①古籍整理 - 中国 - 文集
②历史 - 文献 - 研究 - 中国 - 文集 IV. ①G256 - 53
②K2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087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编辑部 (8620) 85228986 85228960 85226593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 册

一套六册总定价: 236.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文化、传播世界先进文化科学知识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依不同门类区分为六卷，辑录近几年来暨南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著，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

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刺伯人与南海舶”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工作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舛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2002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前 言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其研究必须从史料入手。从事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历史文献学，可说是历史学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以往治史者，往往首先进行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清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贡献尤多。然而，作为历史学中的一门专门学科，在大学设系设所，则应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了。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成立于 1984 年，由教育部批准建立，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并每年下拨科研经费。古籍研究所是专门进行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暨南大学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学者，大多在古籍研究所工作。古籍研究所成立 18 年来，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从而奠定了暨南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基础。此外，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历史系，也有一批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有关工作也推进了暨南大学文献学研究的进展。

本书收录了暨南大学学者有关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论文 16 篇，

20 多万字，基本上都是 1998 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大致可以反映暨大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近期研究水平。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关宋元明清文献的整理研究，二是有关港澳及岭南文献的整理研究。这正好反映了暨南大学历史文献学的两个研究方向。文章均为作者自选，充分反映了作者近年来的研究水平。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张其凡

2002 年 7 月 20 日于广州暨南花园

目 录

总 序	饶宗颐 (1)
前 言	张其凡 (1)
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	张其凡 (1)
张詠事文考述	张其凡 (24)
《大事记讲义》初探	张其凡 (61)
关于《儒林公议》的版本	张其凡 (73)
居延汉简《相剑刀》册初探	马明达 (79)
《潮州三阳志》、《潮州三阳图志》研究	邱树森 (100)
“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邱树森 (134)
从陈大震《南海志》看元代岭南文化的开放性	邱树森 (159)
雍正《广东通志·澳门图》研究	汤开建 (171)
平托《游记》中宁波记事考实 ——兼谈《甓余杂集》中的佛郎机资料	汤开建 (187)
屈大均整理广东历史文献的业绩和成就	罗志欢 (220)
广东文献在国外的翻译、刻印和流传	罗志欢 (234)
《广东海防汇览》初探	陈文源 (249)

《松漠纪闻》史料价值举例·····	范立舟 (271)
澳门史葡文史料举要 ·····	张廷茂 (281)
明兴化府学教授陈锭墓志铭考 ·····	王元林 (301)

陈乐素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宋史研究

——陈乐素教授逝世十周年祭

张其凡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宋史研究，是从 20 世纪开始其历程的。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一批宋史研究的论著问世，出现了首批宋史研究学者，展现了现代风貌。陈乐素先生（1902—1990）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其宋史研究生涯的。他是有数的几位站在 20 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开端线上的前辈学者之一，堪称是 20 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2000 年，恰逢陈乐素先生逝世十周年，谨撰此文，以为纪念，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生平大略

陈乐素先生，名博，自号乐素，以号行。广东新会人。

陈乐素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陈垣（1880—1971），字援庵，是我国现代卓越的历史学家、教育家。陈垣从事教育工作 70 年，

担任大学校长 47 年，培育了成千上万的学子，为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桃李满天下，多有成就不凡者。他从事学术研究 70 余年，是一代史学大宗师，著述等身，成就卓著，在宗教史、文献学、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年代学、考据学、避讳学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陈乐素幼聆庭训，薰陶甚深。

陈垣先生教育子女，治学应能既博且约，由博返约。陈乐素乃其长子，祖父期望甚殷，陈垣先生遂取名为“博”。后来，陈乐素治学，恪遵父训，从博起手，由博返约：始而泛览经史，继而通读几部重要史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最终落脚于宋史，深入钻研，终成名家。成年后，他深慕历史上高风亮节之士安贫乐素的行为，便自号乐素，后来干脆以号行，其名反湮而不闻。

陈乐素自幼好学。5 岁时，他离开母亲和故乡新会，来到广州，住在祖上所开的药栈里，帮着干点儿杂活，学着识别药材。闲暇时，他喜欢看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六七岁时，他就读《三国演义》，陈垣先生见了很高兴，教他在看书的同时，把这部书中每一回初出现的人名地名记录下来。他虽然识字不多，但对摘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事迹和历史事件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乐而不疲。这样，不但看了书，而且学会了初步的治史方法。

1918 年，陈垣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北京定居。陈乐素跟随父亲到北京上中学，不久，东渡日本，到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这一年，他 16 岁。在四年留学生涯中，除上课外，他主要从事两方面的学习：一是有机会就去听日本著名学者的学术报告；二是常跑图书馆，为其父陈垣先生搜集有关宗教史的资料，并抄录、翻译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以及经济、时

事方面的文章。1921年，他翻译的有关日本金本位制度的文章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使他在兴奋之余，加强了研究日本有信心。在明治大学学习临近结束时，他舍不得花时间去做法政治经济学的论文，而是集中精力抄录资料，因而未能获得学位。

1923年，21岁的陈乐素自日本返回广州，先后在广州的南武、大光、培英等中学教授语文和历史课，重点教历史课。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教课之余，他开始系统阅读历史典籍。恰好家中有一部竹简斋版《二十四史》，于是，他的阅读从《二十四史》开始。几年下来，他阅读了大量古籍，做了大量笔记、摘录，历史知识也大大丰富起来。

这几年间，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并于1926年开始北伐战争。满怀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24岁的热血青年陈乐素就在这一年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李福林为军长的第五军政治部任宣传员。1927年4月，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国共合作的局面遭到破坏，广州到处是大逮捕、大屠杀，社会大乱。在苦闷和彷徨中，陈乐素脱离了国民革命军。1928年初，自广州赴上海，进入广东籍将领蔡廷锴将军及一些广东同乡联合兴办的民众烟草公司做事，任文书。工作之余，搜集史料，进行写作，正式开始其历史研究生涯。

1929年，《日本研究》杂志社在上海成立，陈乐素被聘担任主编。在《日本研究》杂志的创刊号和第二期上，陈乐素刊布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和《后汉刘宋间之倭史》两文，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两篇学术论文。两文刊发后，即引起日本史学界的注意，《东洋史讲座》和《大日本史讲座》和《支那史籍上的日本史》中，曾详细地译摘了两文，日本著名历史学者中山九四郎先生认为，两文是“中国青年学者的真实有益的研究”，是“比

较精细的研究”和“有益的文字”，“有必要加以介绍”。陈乐素的意图，是由此二文开始，系统研究中日交流的历史，完成《中日关系史》的写作。但其后仅发表过《第七世纪的对日战争》与《古代日本及其新文化》等文，即无下文了。其故非他，盖因其研究方向已转向了宋代。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寇占领了东北三省，进逼平津，形势岌岌可危。当此之际，中国古代史上外患严重的宋代，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特别关注，有关论文一时陡增。此时，陈乐素已离开了《日本研究》杂志社，寓居北平，以撰文维生。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日寇占领沈阳的消息，不禁潸然泪下，顿感国事颠危，有似历史上的两宋时期，于是决心攻治宋史，以期唤起国人之觉醒，抗日救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1933年，陈乐素在《辅仁学志》上刊布长达4万字的《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这是陈乐素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宋史研究的论文，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长篇鸿文。自此为始，陈乐素即将宋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内容，直到逝世，长达57年之久。

1935年，经蔡元培先生推荐，教育部派陈乐素去日本，为时半年，考察中国古籍流传日本和日本学术界研究中国的情况。此次东行，使他有机会仔细阅读静嘉堂文库的汉籍，尤其是原陆心源“皕宋楼”所藏珍本，收益颇丰。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广州相继沦陷，陈乐素携家带口，辗转到了香港。经香港大学教授许地山先生介绍，到英华中学教国文和历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香港，中学停课。陈乐素为维持生计，只得到半山别墅教私人日语，艰难度日。这期间，香港生活相当艰苦，内地去的人尤其艰苦。陈乐素的薪水，不仅要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而且还要时常接济亲友，经济负担是很重的。陈寅恪先生、袁同礼先生

此时均在香港，都得到过陈乐素的热情帮助。生活虽然艰苦，但陈乐素的学术活动并未停止。他受叶恭绰先生的邀请，担任《广东丛书》编委，为《广东丛书》汇编、校订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并最终出版。他还应友人之托，编过一些当代人物的年谱传略，以笔名发表。

1942年秋，经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推荐，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聘请陈乐素为史学系教授。于是，他携家带口，克服种种困难，通过日军盘查，经湛江辗转流徙，终于在12月到达遵义就职。以一位中学教师而能被当时大后方四大国立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直接聘为教授，实属不易，反映出陈乐素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平已得到承认。到浙大任教，是陈乐素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他踏入高校讲坛，以教学与学术研究为己任，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一年，他40岁。

在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陈乐素身处万山丛中，一面教学，一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陈乐素夜半三更在油灯下苦读苦写的情景，令浙大不少人记忆深刻。40多年后的1995年，原浙大史地系系主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之子张镜湖（时任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还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遵义时陈乐素艰苦治学的情况，称颂他的治学精神感人至深。

在浙大期间，陈乐素开设的本科课程种类繁多，有隋唐史、宋史、中国目录学史、史料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实习、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等。到浙大不久，他又兼任史地研究所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除第一位研究生余行迈外，他指导的研究生，集中在宋史领域。在他之前，张荫麟（1905—1942）执教浙大，指导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接着带出了更多的宋史研究生，发扬光大了浙大的宋史研究，奠定了浙大在宋史研究领域的重镇地

位，直到今日。他这一期间的研究生，主要有余行迈、程光裕、徐规、宋晞、王省吾、倪士毅等人。在浙大史学系教授中，他以“淹贯群书，治学严谨”著称。

1945年，八年抗战终获胜利。1946年，浙江大学迁回杭州。陈乐素也随校迁徙，定居杭州，继续其教学研究生涯。在这一期间，他同情和支持浙大的学生运动，多次掩护进步学生的活动，受到学生的欢迎和称道。1949年，杭州解放，陈乐素积极投身于新的社会生活中。他担任了浙江大学工会的负责人，教授过中国近代史、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1952年，院系调整，陈乐素随历史系到了浙江师范学院，除继续任历史系教授外，兼任图书馆馆长。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亲自提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人事部下调令，调陈乐素进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兼历史编辑室主任，从事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审工作。经过陈乐素与巩绍英、邱汉生、汪钱、王永兴等专家的共同努力，集体编写了高中中国历史课本。这套课本于1950年出版发行后，得到史学界、教育界和中学历史教师的好评。陈垣、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都在《历史教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加以赞许。1954—1956年编辑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套系列教科书，也是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厚礼。陈乐素在其中洒下了自己辛勤的汗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6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陈乐素为兼职研究员。1964年，吴晗主编《历史小丛书》，他被邀请担任编委。虽然有繁重的中小学教材的编审任务，但陈乐素并未停止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只是，除了指导研究生外，他已极少发表文章了。30多年后，安徽师大的万绳楠教授还对一位师从陈乐素的学生无限

感念地说：“我走上史学研究之路，也多亏了陈先生的指引。50年代我在北京当中学教师，《历史小丛书》约我写《文天祥传》，正是在陈乐素先生指导下才完成的。你能跟陈先生学习多好啊，要珍惜这个机会呀！”同时，陈乐素还参加了历史研究所的集体项目——《中国史稿》宋史部分的写作，此书署名“郭沫若主编”，直到“十年浩劫”后，到90年代，才出齐全套10册。

十年浩劫中，陈乐素先是被下放到安徽干校劳动，以年近70之身，承担沉重的挑开水到田头和给农田浇水的工作。1972年，陈乐素被强迫退休，并且既不许在北京居住，又不许回老家广州或新会，只得回到原来的工作之地——杭州，在郊区落户。在杭州落户后，陈乐素重拾旧业，继续进行历史研究，整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旧稿，直到1978年。其间，他曾一度受中国历史博物馆之邀，赴北京从事陈列事迹的审定工作。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从事学术研究不必再隐瞒了。陈乐素于是加快了《宋史艺文志考证》的进度，同时，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顾炎武的《日知录》一书进行研究。为此，他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西湖边上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看书，摘录资料，但从不觉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杭州大学为陈乐素办了复职手续，在历史系担任教授、宋史研究室主任。浙江历史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聘任他为兼任研究员。这一年，全国开始招收研究生，陈乐素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杭州大学两处招收宋史研究生。

1979年，陈乐素南下，返回故乡广州，到暨南大学历史系担任教授，兼宋史研究室主任，由此开创了暨大的宋史研究工作。1980年，中国第一个断代史研究会——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年会，陈乐素出席了年会。大会推举邓

广铭为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上海师大的程应镠先生任秘书长。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重新成立，李一氓任组长，聘请了一批专家担任小组成员，一批老专家任顾问。陈乐素被聘为顾问。同年11月，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在北京开会，会议期间，由陈乐素领衔，十位老专家上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要求在国家计划内单列“古籍整理经费”，每年拨给专款，以使全国的古籍整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陈云同志批转给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姚依林，并得到同意。于是，从1983年起，在国家计划内，“古籍整理经费”单列，其中“高校古籍整理经费”一项，当时定下是每年250万元，90年代后，增为每年500万元。教育部为此款专门成立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高校古委会）管理使用这笔经费，全国高校中，先后建立了18个由古委会直接拨款的古籍（或古文献）研究所，建立了四个古典文献专业，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从此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84年，经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立了古籍研究所（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乐素出任所长。1987年，他改任名誉所长，直至逝世。

80年代中期，在全国编修地方志的浪潮中，广东省于1984年成立了广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陈乐素被聘为委员。这项职务对于他，不仅仅是一个荣誉职务，他为此付出了大量而艰辛的劳动。审阅方志办系统人员的评审材料，到各县市视察、指导地方志的编纂情况，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他无怨无悔，忻然而行。

在暨大工作期间，陈乐素为暨大培养了两届共4名宋史研究生，奠定了暨大培养宋史人才、研究宋代文化的基础。从此，暨大成为南方宋史研究的基地，受到国内外宋史学界的关注。